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生态向度考量及当代价值

包庆德 钱超时

摘要 工业化初期，城市人口聚集形成的工业化城市，既引发人们对生态环境需求的改变，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工业化初期的分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工人不断涌入新兴城市，大量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使城市无序扩张，边界蔓延，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如城市中人与自然环境的物质循环梗阻，城市生产空间被压缩、生活空间脏乱、生态空间混乱、疾病流行等。在资本逻辑控制下，工人生存环境逐渐恶化。从生态向度重温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及城市发展造成的人与自然循环的梗阻问题、人与自然的边界问题以及城市空间布局问题，从而为我国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建设统筹布局、长远规划、绿色发展提供生态启示和理论借鉴。

关键词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生态向度考量 生态文明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A811;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51X (2023) 04-0052-10

工业社会初期，工人的大量聚集所形成的工业化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与所居住城市的自然环境不断发生物质变换和物质循环。伴随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人的居住方式尤其是工人的居住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这关涉着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城市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著成的《论住宅问题》（1872年），从生态向度即生态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考察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这些变化在工人住宅及城镇化问题上的具体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研究”（批准号：22AZX002）。

【作者简介】包庆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邮政编码：010020；钱超时，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内蒙古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的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现，并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城市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①这对于探讨解决我国城市化人口聚集所引发的关于人的住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和城镇化建设提供思路。

一、工业化初期城市人口聚集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

在工厂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时期，大量工人聚集于工业中心城市，与此同时，生产相对集中的乡村和小市镇也不断扩张，形成了人口、技术、资源持续扩张形态的新生城市，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

（一）劳动者的大量聚集是工业化城市形成的原因

劳动者的大量聚集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城市住宅紧缺问题。工业革命时期的德国柏林，由于工业化大生产急速推进，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由1820年的20万左右猛增至1870年的77.4万（王章辉、黄柯可，1999），由此导致了住宅与生态环境关系日趋紧张的问题。与以往相比，工人的住宅越来越集中且密集，单位居住面积的工人数量急剧增加，但城市住宅数量却没有明显增长，城市化及其住宅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多半是“住房短缺”时期，尤其是“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②虽然蒲鲁东主义者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住宅问题和由此衍生的城市生态问题，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③恩格斯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④

劳动者的住宅环境状况堪忧。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生物有其自身的生态位，生物在自然界中分散居住，其生存的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一定面积生态系统只能由一定数量的生物生存，一旦超过环境承载限度，种群密度就会下降。生产力急剧提升使工人大量聚集在城市，但工业化初期城市的住宅建设还不能满足工人居住的需要。工业革命初期由于生产的规模化，也带来了工业城市“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⑤不仅对城市的有限住宅是一种压力，对城市住宅所处的生态环境条件也是极大的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城市中显现出不和谐现象。工人阶级所面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7页。

不仅是接连紧缺的住房问题，而且“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①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工人阶级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因工业化大生产而变得更加恶劣，如2795个家庭，大约12000人，挤住在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② 与此同时，工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存需要大量增加，对劳动力、资源、生产条件的需求不断提高。因此，工业化初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正常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出来。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③

（二）城市人口聚集引发劳动者对生态环境需求的改变

工业化初期劳动者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地选址发生新的变化，以前人们为了生活选择居住地，现在人们为了生产选择居住地。相较于乡村和小市镇，为了工业化大生产工人住宅集中建造在矿山等生产资源附近。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始出现比以往更多的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地，人们不再以生存和生活为主要目的聚集居住，而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集中居住。住宅区的选址迁移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二是工人阶级的城市住宅环境恶化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人们向往优美的生活环境，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城市住宅区基本的生活物质循环尚且不能得到保证，更何况优美的生活环境。从生态向度分析，人们对良好生存环境的需求，只有当人和自然形成良好的物质循环才能实现。在人口大量聚集的城市，生活垃圾需要足够数量且高效的处理设施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好，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城市新形成的工人住宅区中，生活垃圾转运和及时处理能力并不完善，而资本家不会用生产力提升所创造的剩余财富去改善工人的住宅条件和卫生状况。此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④ 工业化大生产使人群过度集中，对城市生存环境有限的承载力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一现象与生物分散居住生存并保持合适的生态位的原则相违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⑤ 而政治集中的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城市中体现出更甚于以往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生态问题无法通过蒲鲁东主义者的改良措施解决，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必然以资产阶级利益增长为中心，而不会以人的根本利益为中心，解决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城镇化建设。

（三）城市人口聚集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

一是劳动者住宅区展现出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新特点。工人住宅的地理位置受到了生产资料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社会中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最主要的是满足生活需要，与以往不同，一些新兴的城市伴随如铁矿、煤井等自然资源的生产而产生，这些工业化城市的地理位置受到生产资料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业化时期住宅问题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受到“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山等等的位置”^① 限制，工人不得不居住在资本家专门为修建的紧邻自然资源的住房中。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最主要的是满足生产需求，生产资料在哪里被开发，工人就被聚集到哪里，住所也就被集中在哪里。劳动者住宅区新的特征在工业化初期城市中初见端倪，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不断聚集的产业工人形成的住宅区，不再是以生存和生活为主要目的聚集和迁徙，而是以生产为主要目的聚集和迁移。城市形成的方式由依靠生活资源转变为倚靠生产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工人的住宅呈现出向自然资源丰富生产地聚集的特点。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对自然原材料的需求巨大，越来越多的煤、铁等原材料被开发出来，越来越偏僻的地区也被开发，在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重新聚集形成新的工业区，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工人住宅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在这里充分显现出来，同时也改变了工人的居住方式，新的居住方式使工人在偏远地方重新聚集，形成了新的工厂乡村，“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② 于是形成了以自然资源为依赖的工业中心城市雏形。

二是城市中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们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工人生活在自己以及他人制造的垃圾堆中，人的生活环境极端恶劣，人们的健康状况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工业化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只要有可能，谁都更愿意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③ 工人住宅区无法处理的大量废弃物污染了水源、空气等生存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状况不仅危害工人的健康和生命，还会通过空气和水源传播疾病，“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④ 疾病不会因为住宅的分区而仅传染工人这一单一群体，正如贫民窟“小爱尔兰”流行的疾病随着空气传播席卷整个城市，同一城市富人区的资本家也无法在其中独善其身。^⑤

三是工业化大生产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但资产阶级却无法发挥人的能动性做好城市规划。资产阶级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就是转移，把工人住宅区从一个地方转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到另一个地方，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只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一场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呕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①

二、从生态向度考量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问题

在自然界中人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法则一样，都应符合适度分散的原则。问题在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促使人口大量集中，城市住宅的生态问题前所未有且急剧凸显。因此，从生态向度考量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问题，剖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我国在城镇化建设中汲取经验。

（一）人与自然循环梗阻

随着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出现的城市生态问题，其根源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障碍。在人群聚集的住宅区里，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都大量增加，但是没有相应的措施或者更高效率的设施处理生活废弃物，造成大量的生活废弃物无法顺利归还自然并像以往一样被分解，使得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出现梗阻。严重的住宅问题在工业化大生产城市的首次出现，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人与自然物质循环梗阻所呈现出的社会特征。同时，工人大批量聚集并集中生产，大量的物资消耗和废弃物堆积，均需要设施转运，但新兴的城市并没有具备相应功能，废弃物的处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堆积在工人住宅区，使得自然循环承载力超载，“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②因此，工业化初期的城市面临着自然环境物质循环的障碍。

（二）人与自然界的边界问题

自然是人类活动的立身之本，在自然空间里，人的活动受自然的制约（周光迅等，2015），其表现形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住房的地理位置开始受到生产资料的制约。在生产力较低的农耕社会，人们居住受到的主要生活资料的制约；在工业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大地提升，人们的住宅也开始受到生产资料自然因素的制约，为了生产更加方便快捷，工人的住宅住址被限定在矿山周围，围绕生产资料的城市开始形成。二是工人的居住地点开始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迁，当生产力较为低下时，人们随生活资料的丰饶程度而定居生活，现在则随着生产资料的开发程度而聚集，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化。在资本聚集初期，圈地运动让世代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变成背井离乡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工人被一次次地抛到另外的城市，居无定所。不仅如此，工业化城市中生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越来越多，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更多能源的支撑，生产也从依赖水力等可再生能源变为依赖如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新型工业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

城市由此形成。

人类在开发新的生活住宅区——城市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城市扩张到哪里是底线；二是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如何划定。城市在不断快速发展并持续推进，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界定城市和自然的边界，正确考量并准确评估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影响，是我国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征程上亟需解决的问题。有人基于1990—2017年城市扩张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生态系统使用模型模拟进行预测，认为未来城市扩张占用更多的耕地和草地将是复合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加剧的主要原因（Song et al., 2022）。对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时空分布的分析显示，我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协调度较低（刘耀彬等，2005）。

城市建设不能无序蔓延，城市的发展应当与生态环境协同共生。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与森林、河流、湖泊、山体等共同形成城市生态屏障，成为城市开发的实体边界”。^①要因地制宜地以农田、森林、河流、山体等自然边界构筑城市的生态环境界限，从而不断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城市是人类构建的与自然协同共存的生命有机体，城市边界是人与自然的交界处，对其开发需要考量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划定城镇开发的边界也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要以城镇开发建设现状为基础，综合考虑资源承载能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城乡统筹、城镇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框定总量，限定容量，防止城镇无序蔓延。”^②因此在城市不断扩张发展的进程中，要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以及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包庆德、刘雨婷，2022）。

在城市建设中，为了防止城镇无止境蔓延，在城市整体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要通过建设“紧凑城市”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充分利用城市的空间，构建高效生产、精简生活、绿色发展的“三生”格局，还要充分利用可循环技术节能减排，促进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城市发展巾，也要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将农田、森林、河流、山体等自然边界作为城市发展边界，从而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形态。

（三）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

城市本是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统一，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城市的空间分配在资本逻辑控制下背离了劳动者的意愿。与乡村和小市镇相比，居民在被压缩的活动空间中生存劳作，对于生产、生活以及生态需求也有所改变。城市的住宅空间是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0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0页。

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有机结合。从城市空间角度分析，“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亨利·列斐伏尔，2021）。虽然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却无法享受剩余价值增长带来的成果，他们被迫居住在狭小肮脏的住所，生产、生活、生存条件恶劣。在《论住宅问题》中，城市住宅区划分为富人区和贫民区，“最优雅的街道背后紧挨着就是污秽不堪的工人区”。^①住宅空间的划分也划出了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城市空间上体现出来，城市住宅区被划分为“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和“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②城市空间划分差异中显现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全方位的剥削和压迫，即恶劣的生存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工业化大生产提升生产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却无法改善自身恶劣的生存环境。

三、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生态启示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③也是自然的历史进程。优美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城市建设中从生态向度考量城市发展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可以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重温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借鉴其城市发展解决的经验，从生态向度考量城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

（一）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做全局性统筹

我国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控制城市发展的伟大超越。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有旺盛的城市住宅需求，因此在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中，城市边界、空间容量及生态承载量等要素需要提前规划设计，以避免出现城市无序扩张、空间浪费、资源环境承载力过载等问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住宅，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④的向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⑤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角度规划构建生态宜居城市，依托城市周边自然资源禀赋，充分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不断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1页。

构建合理的城市格局，要界定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更好地发挥城市整体功能。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描述了曾经繁华的移民区现状，“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① 可见城市建设规划提前留白的重要性。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要以“人民宜居安居”为出发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天然山川、河流、森林边界为界限，留白城市未来发展空间，合理规划城市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科学预留一定比例的留白区，为城镇未来发展留下开发空间。”^②

（二）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作长远性规划

要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提前预防自然历史进程中城镇化发展可能遭遇的“城市病”，以城镇化发展的巨大动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自觉从生态向度考量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问题，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规划我国城市建设布局。

城市规划设计应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③ 的主观能动性，全面统筹，提前规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自然资源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影响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内部水系与外部周围河流湖泊以及城市绿地和外部林地等生态园区，共同形成了生态网络，是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的生态廊道。

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完善，受到生物群落自然生长时间因素的影响，与城市建设完成时间不同步，城市生态系统网络的形成受自然规律控制，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趋于平衡稳定。因此，从生态向度规划城市发展，需要考虑城市的生态功能在更长远时间尺度上的发展完善。从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这个根本需求出发，规划设计城市生态功能，统筹城市内部水系及绿地生态系统，统筹城市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协调发展，提高空气质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从而再现城市绿水青山，为城市居民休闲宜居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

（三）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

“绿色决定发展的成色。”^④ 城市工业化生产要走绿色发展的路径，在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物资时应防止过度开发和粗放使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促进生产过程集约高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城市规划要体现“生态城市”与自然和谐共成一体的建设理念，要因地制宜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统筹城市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页。

我国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① 叠加发展的过程。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快，人口数量多，从2000年到2014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总数还多。^② 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这一关键节点，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因人口大量“聚集”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解决好城市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人民群众提供宜居安居的优美环境，应从生态向度考虑城市建设问题，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城市建设中应遵循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布局的基本理念，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实际规划工业用地、居住用地、保护生态用地，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城市发展要义。^③ 规划设计城市空间格局应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依托城市周边现有的自然空间结构，保留合适比例的生态空间，勾连城市内部生态环境和城市外围自然环境，形成生态网络，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

在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要“超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非文明性’，培育生态友好的‘文明型’生活方式”（黄承梁，2023），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推进城市生产集约高效，驱动产业绿色发展，共同达到人与自然和解及人与人和解的最终目标。

城市住宅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人民向往美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期望诗意地栖居在自然环境当中。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城市建设中，要提供优质生态环境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让城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美丽宜居的城市环境带给人们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城市建设，要积极建设城市绿色空间，结合以人民为中心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城市生态功能，开启绿色开发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 包庆德、刘雨婷（2022）：《制度底线：确保中国国土生态安全的控制线》，《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21—129页。
- （法）亨利·列斐伏尔（2021）：《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9页。
- 黄承梁（2023）：《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论中国马克思主义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7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3页。

生态哲学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118—129、164页。

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2005）：《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自然资源学报》第1期，第105—112页。

王章辉、黄柯可（1999）：《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26页。

周光迅、武群堂、钱厚诚等（2015）：《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5页。

Song, S. X. , C. Y. He and Z. F. Liu, et al. (2022),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s of Urban Expansion on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in Drylands”, *Landscape Ecology*, 37, pp. 2783 – 2802.

Engels’ The Housing Question: Ecological Dimension Consider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BAO Qing-de¹, QIAN Chao-shi²

(1. College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0,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industrial city formed by urban population gathering triggered the change of people’s demand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duc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Engels analyzed in “The Housing Question”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workers poured into emerging cities, and the gather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cities led to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the spread of borders, which led to new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r example, the material circula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is blocked, the urban production space is compressed, the living space is messy, the ecological space is chaotic, and diseases are prevalent. Under the control of capital logic,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workers ha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Reviewing Engels’ “The Housing Question”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ycl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urban spatial layout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and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provides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people-centered city with overall development, long-term planning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gels; The Housing Question; ecological dimension consideratio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薛亚玲